

# 国家安全与民间宗教文化交流

## ——兼谈民国时期汉藏佛教交流的历史作用

黄夏年

[摘要]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除了政府行使公权力,民间力量也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补充。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运用得恰当,宗教及其文化在这方面大有可为。民国时期,九世班禅、喜饶嘉措、太虚等高僧大德掀起了汉藏文化交流的高峰,影响了现代佛教的发展,增进了民族之间的感情,对国家的前途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国民党中央政府、政府设立的蒙藏委员会等组织,及一些地方政府也积极支持、参与其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民国时期的汉藏佛教交流有着深刻的政治与国家安全的背景,在维护领土完整、反对分裂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为今天的民族、宗教、安全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青海;民族团结;安全战略;藏汉佛教交流

中图分类号: B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5)07—0076—06

作者简介: 黄夏年(1954—),男,江苏常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编审,研究方向:中国佛教。北京 100732

### 一、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战略

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显著增加。

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外联(系)内引(导)”既是中央政府也是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内容。政府要完成这个任务,除了需要深邃智慧外,更需要有高度权威和工作艺术。现今中国内政,发展民生、教育、经济等是政府日常主要工作。但在当前国内外现实环境下,国家面临着外有领土纠纷的挑衅、内有人民安全受到威胁的双重危局,南海问题和安全问题成为我国政府近期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创新社会治理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

对于国家的内政外交,除了政府行使公权力来处置,民间力量也可成为一种重要补充。从历史治理经验来看,如果使用恰当,宗教及其文化对国家的外交内政同样有一定补充功能,充分调动宗教界的积极因素,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内外两方面都有助于安邦治国。“每个民族文化,因地域、时期皆有一种风俗习惯上的范围;从好的方面说,往往由此能达到人心统一;从坏的方面说,有时也因此而滞塞、拘泥。”<sup>[1]</sup>宗教文

化除了有一些糟粕,还可发挥其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及信教群众的正向功能,但是这些正向功能有时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如佛教就有这方面的正向功能,现以之为例来说明宗教文化在民族团结中所能起到的作用:

以外交为例。现在我国政府在世界的影响不断扩大,中国地位也在不断提升,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理应是国外外交。但是我们在外交方面却不尽人意,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现在处于大国地位小国外交的状态。例如南海问题上我们还没有打开局面、缅甸的铁路也处于停滞时期,这些僵局怎么化解,除了政府的智慧之外,我以为民间外交也是一个重要方式。佛教文化交流自古就是中外民间交流的主要部分,对沟通中国与域外国家的关系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也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我国周边现在有很多佛教国家,特别是南海地区,佛教一直是其传统宗教,伊斯兰教也在这一地区有较深影响,利用宗教力量,我们或许能够打通人为设置的边界障碍,进行宗教与文化的无界交流,增进与周边国家的了解,破解我们现在面对的困局。

从内政来讲。民族团结一直是稳定政权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也是我国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最重要基础。历史或现在都可以找到例证,说明宗教曾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起过作用。历代统治者都重视民族问题,并且利用宗教信仰来增进不

同民族之间的和谐团结。特别是清代对处理民族问题有独到认识,皇帝曾经深刻地认识到佛教是维护皇稷社土的有利工具。进入现代社会,虽然社会形态已经彻底改变,但是宗教里面所包含的护国佑民思想与爱国爱教主张仍然没有改变。民族团结所起的就是护国佑民作用,爱国爱教就是国家与宗教、统治者与宗教人士之间正确关系的表述。现代社会更应该让宗教正能量发挥出其理论和实践价值,使之更好地为国家与现代社会服务。特别是宗教在慰藉心灵方面能起到重大作用,还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又可拉近各民族之间的情感,一个共同的信仰,可以减少诸多民族间的纠纷,是充分体现尊重与理解的民族团结的基石。

党中央强调:“为更加有效地统筹国家安全力量的建设和使用,要健全职能、提高效能、统筹资源,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领导体系,充分协调各种要素,激活各种力量。”<sup>[2]</sup>民族团结是国家内政外交的重要内容,对国家的统治与安全关系重大,不可小看。民族团结是以宗教及其文化交流为基础的,离开了交流,民族团结就是一句空话。民族交流说到底就是文化的交流,宗教文化能够在这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成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传统,从古到今从没间断过。例如青海佛教藏汉两支的交流就一直存在,清代的伊斯兰教汉学运动也一度发生,这些不同宗教的文化交流是促进青海民族团结最有力的例证,也是千年以来中华各民族文化相融的结果。

开展现代民族宗教的交流,仍然要以古人为鉴,现代民族文化交流的参考背景则是最近的一百年来的民族团结文化交流史。“民国来以汉、蒙等同为构成共和之主人;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尤以联合国内诸族平等相待为原则,则西藏无论在何种理由上说,皆应以原为中华民国一分子之资格,共同努力建成中华民国为得计。”<sup>[3](P.460)]</sup>民国以来的百年民族宗教文化交流例子,可以给我们更多启示。

## 二、民国时期的汉藏佛教交流与国家安全

以汉藏佛教交流为例,历史上汉藏佛教一直存在着密切交流关系,民国佛教领袖太虚大师总结汉藏关系时说:“……汉、藏在皇古原出同族,即从唐以来之历史言,文成、金城公主入藏以后,随从以居藏者非在少数,藏族之血统早与汉族混合。而藏族文化之佛教,亦多有由汉输入之成分;元、明、清迄今,藏族佛教又影响于汉人甚多,则无论在血统上、文化上,汉藏皆富有极亲密的不可分离

之关系。加以汉人亦多数信崇佛教,并能了解且推重西藏佛教,此均为求之英、俄等国民中所绝无者。”<sup>[3](P.460)]</sup>

进入民国,汉藏两支佛教的文化交流从佛教的角度来看,是因为“单就译师和译业方面说,到了晚唐义净法师和宋初以后,中国的译业就断绝了!而印度正是晚期佛教发达的时代。西藏传承这印度晚期的佛教,就很多了。在教法方面,印藏大德,都努力向西藏输运。由此,也可以说,全部印度的后期佛教皆输入了西藏,未尝不可。至于中国内地所有的教典,依之修行,固然是尽够了的。但觉得中国内地佛教,还未圆满,有好多的圣典,没有翻译过来,尤其是后期佛教。所以需要西藏佛教来补充。因此,太虚大师在办武昌佛学院的时候,就见到这一点”<sup>[4]</sup>。故“西藏佛教,在文献方面,在制度方面,在修持方面,都有其特长之处。内地佛教重兴,借镜之处实多”<sup>[5]</sup>。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可以说是“中国佛教所缺少的很多,不假翻译运载过来,是没有第二个方法。文化的沟通,也是由此的”<sup>[4]</sup>。

当时汉地佛教流行“中国佛教自唐武灭佛以来,许多内典都告失传,所以逼住中国现前住持佛教的人物,不得不向外探索,如日本、西藏、锡兰等地的佛教思想灌输,或内典的来传,无不欢迎接受”<sup>[6]</sup>的想法。甚至有人认为今后中国佛教建设在“行持道德之轨范应采取于西藏也”<sup>[7]</sup>。当代佛教大师太虚是一位具有国际眼光的大师,他一生志在整理革新中国佛教,完成世界佛学苑,实行菩萨学处。他认为:“现在印度虽然没有佛教,而人民受佛教影响太深。又在锡兰、缅甸、暹罗、南洋一带,还保有原始佛教的教义和制度,并且有万万的佛教徒。在蒙藏以及日本、朝鲜一带,也有广大的佛教徒和丰富的佛学宝藏,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研究。”<sup>[8]</sup>在大师高瞻远瞩的眼光中,早已看到这点,“认为中国佛教现存之不够,有大量接受世界各国的佛教之必要,使各种不同的文字的外来佛教融成为中国的佛教,所以大师所办的学校都有世界性的,如北平的巴利文系,厦门的华日文系,武昌的中英文系,四川的汉藏文系等,同时也指导不少的佛教青年到西藏、日本、暹罗、锡兰等地去留学”<sup>[6]</sup>。他继承了传统汉地佛教的圆融思想,强调汉藏佛教交流,就是要圆融汉传和藏传佛教后而建立一个新的中华佛教,甚至因“中国为儒化之发源地,亦为汇合汉藏文佛教之渊海”<sup>[9]</sup>。例如从印度佛学上看,汉藏两教的理论可以互为补充,“汉藏虽都有性相二宗,但是两地都有所缺,如汉文佛教缺少关于空宗的,有佛护、月称、阿底

峡、宗喀巴等发挥空宗的理论,这些都应当学。关于有宗的,中国于安慧的唯识不完备,亦需补充。至在西藏方面,也应学汉文佛教的护法、戒贤、玄奘、窥基等的唯识义,及罗什以来三论宗义和安慧中论释等。这样,才可和合成空有圆融的大乘。”<sup>[11]</sup>从汉地佛学来看,则“禅净的修学有成就的,对于西藏也可作转播,使藏人亦对台贤禅净有所研习。如此,乃能澈佛法之底,尽佛法之量”<sup>[10]</sup>。圆融汉藏佛学的目的在于让中国佛教走向世界,故太虚强调:“今应普容遍摄锡兰等三乘共法律仪及大乘性相与西藏密法,乃可将中国佛法发达兴旺,一天一天的充实复活。而在复活的过程中,发挥台、贤、禅、净、总合的特长,将律、密、性、相,彻底容摄成整个的佛法,于是中国的佛教因之重新建立,而亦可成为现代的世界佛教了。”<sup>[10]</sup>当然也有人指出:“中国内地佛教,现虽极需西藏佛教之补益,而确不需要‘西洋镜’式的‘铃鼓佛教’;所需要者为西藏所传承之真正的深广两大教系与有组织之修行仪轨的佛法。不需要铺坛结缘引人热狂,而需要如何导人实学潜修。夫欲谋根本宏传西藏佛法,补救内地佛法之缺点者,则更当深切注意施予适合内地僧伽之教育,并西藏所传承之深广两大教系的圣典之翻译。”<sup>[11]</sup>总之,汉藏两支佛教的交流肯定是要取得双赢的局面,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对西藏现代化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汉地佛教界“不但接受西藏佛教,并且把中国内地特有的文化典籍,也可以译为藏文,输入西藏。如蒙藏委员会,译三民主义为藏文,使西藏人民知道中国文化的好处”<sup>[4]</sup>。

九世班禅大师与高僧喜饶嘉措大师是推行汉藏两种文化交流的大师,他们与内地太虚大师等人发起汉藏沟通运动,掀起了近现代汉藏文化交流高峰,影响了现代佛教发展。太虚说过:“四五百年以来汉族之佛教日益衰,而藏族佛教则以宗克巴之振颓复兴,光化满蒙,迄今犹保隆盛,故重昌汉佛教之有资于藏佛教,殆为现时所必须。况乎藏佛教久为藏、蒙、满民族文化,与夫藏族之奠居西藏,遍布于康、青、宁诸省,实为构成大中华民族而建立大中华民国之柱石哉!夫佛教与汉、藏民族文化之密切既如彼,而汉、藏佛教与中华国族建成重要又如此,乌可不沟通阐发之耶?”<sup>[12]</sup>太虚为了促进汉藏佛教交流,专门建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佛教学府——汉藏教理院,组织到西藏的留法团,以及广交藏传佛教高僧,“汉藏教理院无论在国家上,在民族上,所负的任务非常重大。这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沟通汉藏的文化,促进民族的感情。这种工作,在我们现在国家复兴的时候,

是很要紧的刻不容缓的工作”<sup>[4]</sup>。太虚又于“民国十四年即派遣大勇(本院监院)、法尊、严定、观空、恒演等武院高材僧,留学西藏,以图沟通汉藏佛学,这一计划的成功,不仅沟通佛教,而且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团结”<sup>[8]</sup>。法舫法师评价:“昔年太虚大师有见及此,命弟子大勇、大刚、法尊等组留学团,赴藏留学。又一方面,与留居内地之班禅、白普仁、多伶格什、诺那等联络,旋又成立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于重庆,聘请喇嘛教师,收留西藏学生,专门研究西藏佛法,并藉此以与藏人联络感情,共扬法化,实为今日获得此种结果之大原因。”<sup>[8]</sup>又指出:“今则,彼此互通,教学相承,喇嘛即和尚,喇嘛教即佛教,在佛教本身上,当可明了佛法在汉在藏,虽因文因地因时之制宜不同,而所传之佛法原无二致,务使两民族间对于所信仰之佛法,了达一体,则两民族之宗教信仰合一,根本不生歧异之见,始能言‘沟通汉藏佛法团成一家。’”<sup>[5]</sup>显然,在佛教人士看来,这件事情是“此真国内之真正发心学佛法者之最好因缘也。亦即民族团结,国家前途之福音也”<sup>[5]</sup>。

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汉藏交流是持支持态度的,汉藏教理院学僧毕业典礼上,中央政府“行营贺参谋长题赠本院‘沟通文化’的匾额”<sup>[4]</sup>。喜饶嘉措大师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积极推动藏汉佛教交流,法舫曾经撰写文章指出:“中央当局为沟通汉藏文化起见,特聘请西藏别蚌寺格什喜饶嘉措担任中央、北平、武汉、中山、清华五大学讲学,已于三月二十四日抵京。各方对此,颇为重视,欢迎招待,亦极隆重。且已于中央大学开讲一次,听众踊跃。喜饶格什之来讲学,在本国国家、民族、教育、佛教各方面,本为一件应有的平凡事,不过内地各方(尤其是学界)向来是鄙视佛教教学,轻忽边疆民族文化,因此对喜饶之来,就以为是稀有的事了。吾人希望喜饶格什,为中国整个国家与整个民族着想,为发展佛教文化计,本所学之特有的西藏佛教教学,为国为教,竭诚宣化。吾人于兹有三项意见一陈述之:第一,中国民族重理智轻迷信。佛教之学,博大精深,重理智,贵实行,绝非一般人士所想像之虚玄迷信。故愿喜饶格什,多以大乘空有之学理,提示学者。顾佛教对于中国民族,作了绝大的利益,边陲各民族因得佛教之教化而归向中原,其功勋尤为不可思议者也。故愿全国人民以爱国家之心,爱护佛教;以复兴国家之力量复兴佛教。论者有谓:果能进以佛教为国教,定佛学为大学必修学科,则中华民族之发展,将有不可思议之收获。此中央教育当局应注意者一。第二,吾人以为中央既提倡佛学,聘藏僧讲学各大

学,然于中国根本之佛学——汉文佛学——尤应注意提倡。盖中国汉文佛学,已成为中国文化之一重要因素,尤为今日文化学术界,所应重视研究者也。以是之故,亟应聘请中国佛学界具德有学之大德僧,为各大学汉文佛学讲座,况所谓沟通文化,必相摄相溶,西藏文化纯为佛教文化,如不发扬中国本有之佛学,而言沟通汉藏文化,似嫌单调。此应注意者二。第三,希望中央教育当局,对于吾佛教界,已建立之沟通汉藏文化之文化教育团体,如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菩提学会等,应予以切实之指导与资助,使其成长发展,曷止有利于佛教?此应注意者三。以上所述,为吾人区区之见,愿喜饶格什及教育界当局,留意及之,则佛教幸甚,国族文化幸甚。”<sup>[13]</sup>可见在佛教界眼里看来,喜饶嘉措大师在内地的大学讲课,不仅是佛教界的光荣,更重要的是对国家与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有重要的帮助,汉藏两支佛教交流也在喜饶嘉措大师这一讲课活动中,得到了利益,所以太虚在重庆汉藏教理院欢迎喜饶嘉措大师时专门提到:“本院名汉藏教理院,固在专门研究佛教学理,而同时还含有沟通汉藏文化和联络两民族间感情的意义……喜大师此次到内地来,固然一方在宣扬西藏文化,同时也能观察到内地的风俗环境与佛学思想,希望将来能使西藏也在向来传统的束缚上解放出来。这样,才能做到汉藏教理的彻底沟通,同时,也彻底做到了汉藏两民族文化和感情的沟通。这就是今天欢迎喜饶大师的特殊意义。”<sup>[14]</sup>(P. 183-184)

喜饶嘉措曾在抗战时期当选参政员,1938年11月6日出席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二次参政会,在闭幕前“参政员喜饶喜措等25人,提请政府注意佛教文化、以增进中藏感情案,最受热烈鼓掌欢迎。又谢健先生等20人提议推行佛教以加强民族团结、开拓国际援助案,经合并讨论后,照审查意见通过。”<sup>[15]</sup>即使是在抗战时期,佛教界也没有放弃重视汉藏两支的交流,著名的佛教刊物《海潮音》就指出:“对国内佛教,注意提倡改良一般寺僧的生活、教育、训练方面,特别注意的是蒙藏方面的发展。我们要从佛教的文化、宗教沟通融洽中去把握住蒙藏边陲的同胞爱国团结的信心,加强我们抗战建国的力量。”<sup>[16]</sup>

民国时期是现代汉藏交流开始,聚焦点在佛教。这是承继历代传统,正如太虚所指出:“西藏问题,其实是藏族问题;而说到藏族,又必连带到西藏佛教。藏族超越个人生命以上之全族精神生命,所以要融洽藏族必先要了解西藏佛教。”<sup>[17]</sup>(P. 640)太虚的话表明治理藏区的思路不能

离开佛教文化,民族团结“于此中能因其固有发挥其用者,尤为舍佛教更无他属”<sup>[18]</sup>(P. 448)。民国时代的藏汉佛教交流并不仅仅是宗教及其文化问题,或者是“以汉文藏文而研究此两种文字的佛法,使互为沟通以相补充”<sup>[19]</sup>(P. 442)的简单学术背景,“然今所云西藏问题,非西藏之地域及藏民本身有何种之问题,乃如何能融合为大中华民族而共建成新中华民国之问题也”<sup>[14]</sup>(P. 276)。佛教界人士指出:“原来,汉藏两族……只不过是民族不同,文字不同罢了。西藏在政治上,历代都是归顺服从中国的,从唐而宋而元而明而清的各朝代,没有一代不是隶属中国的,所以西藏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和别的省分是一样的。不过没有人注意。民国复兴,对西藏虽有人注意了,但是沟通汉藏文化促进民族感情,这些工作,还是没有人注意到,何况去实际进行呢!我们自己放弃我们自己的领土,政府是应负责任的。可是,我们看看别的国家,对于西藏是如何在侵略!日本对于西藏距离很远,西藏并非所属,俄国对于西藏,也非他的所属地,英国与西藏虽然接近,但终非英国所属,而他们对于西藏的侵略开发,都很努力,或是去做研究文化工作,或是做地理考察工作,或是做民情风俗等的调查工作。他们从各方面的情形,用不同的手段,无微不至地想去认识西藏,侵略西藏,这些在他们所发表的文字上,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的。再看我们本国呢,反而倒很少有人注意到西藏,甚或去摧残西藏,去播离民族情感。到今日才感觉到开发西藏重要了。但是,我们想用什么方法去开发呢?自然除了根本上用宗教情感和文化之外别无办法,所以唯有佛教才走得上一条路。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以谋设法打通汉藏政治间的隔膜。若论其方法,离开佛法决无第二个方法。”<sup>[4]</sup>

可见,汉藏交流有着深刻的政治与国家安全的原因,特别是面对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反对分裂的诉求。当时西藏正在受到亲英派人士干扰,“仅数人曾游学英国、或印度,以练英国式之陆军耳。然若以非佛教之武力,为破坏佛教之侵迫,则由其护教热诚与英人之诱惑,正不难驱达赖及西藏僧民全部亲英,致西藏以至中国西部陷入英人支配之下。如此,则班禅或将由内外蒙媒介,导入苏俄武力,而中国西陲,有成英、俄角逐场之危险。”<sup>[14]</sup>(P. 56)十三世达赖在逝世之前已经开始担忧西藏会被某些人利用分离出去,故其“遗嘱主维护佛教,勿使外国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乘几(机)侵入以混乱西藏佛教之系统。”<sup>[14]</sup>(P. 111)一些藏族佛教界人士也表达了担忧,如贡觉、诺那呼图克图就对

太虚说过:“(十三世)达赖为深达佛法擅长政治之人,欲令达赖归向中央,必得佛法与政治兼优者为使,方足以完成汉藏合作。”<sup>[14](P.112)</sup>他们希望在“惟知政治者不能,惟知佛法者亦不能”<sup>[14](P.112)</sup>的情况下,请太虚以中国佛教领袖的身分亲自去西藏联络感情与推动汉藏交流。正是在这种危险下,佛教承担的是挽民族于中华大家庭,救国土于不分裂祖国的历史责任,从事汉藏交流“皆可致驱迫达赖与藏族背华向英之患,应速改途易辙以挽救之者也。”<sup>[14](P.56)</sup>而国家也可以赖于此完成“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之政纲下,许西藏以高度自治,而川、滇、康、青、宁、甘、新、察、绥各省汉蒙或汉藏,或汉藏蒙,或汉蒙藏回,杂居其中之藏族蒙族皆奉佛教,而各夷族亦多崇佛。欲期各边疆民胞集力内向,融洽无间,同建大中华民国,亦唯有尊重其信仰,听从其习惯,而渐进于和洽”<sup>[18](P.448)</sup>之目标。

所以汉藏佛教交流从大的讲,是对国家起到了作用——“庶几汉藏佛教有融洽一炉之时候,汉藏民情有和洽一堂的机会”,<sup>[20](P.86)</sup>但是对佛教界来讲,还有更大的任务要完成,这就是其目标还在于“由大中华完整之佛教,化成大中华完整之民族,进而共同建设大中华民国之新时代”<sup>[17](P.448)</sup>。因为“我们佛教在现时代里,正应当运用其现代的方式,谋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才可把世界的人类建筑在安乐窝中。所谓现代化是什么呢?就是溶(融)合各种系统的佛教,成一个力量去救济世界。唯是一种一系的佛教,则不能应现世界全人类的要求,所谓供不应求。因此,必需要有全部的计划、整个的精神,把世界佛教取长舍短,溶(融)成一体,才可把佛教发扬于现世界的。能这样做,佛教才配得说是救世的宗教,佛教徒才配上说是救世的佛子。汉藏教理院所负的责任,即是溶(融)合世界佛教,发扬世界佛教,救济全世界人类的一种工作。”<sup>[4]</sup>

由此可知,民国时期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是由多方面综合原因促成的,除了佛教界自身面对严重的内部危机之外,与当时西藏所处的危险处境有重要关系,佛教界正在这一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利用佛教信仰的天然优势和同一宗教信仰的目标,勇敢地承担了护国佑民的历史责任,发扬了传统爱国爱教的精神,因为“我们既然知道开发西藏的事业,应先从文化入手,文化打通了,则民族与民族间也就不隔膜了。从此汉藏合为一家,国政上自是进步,国防上多一屏障”<sup>[4]</sup>。他们的这一行为,得到了民国政府的支持,凡“赴藏游学僧侣,由佛教总会每年六月以前保送本会考核派遣之。

每人补助往返旅费各二百五十元外,每年补助汉僧生活费八十元,藏僧生活费一百二十元,游学期间五年为限”<sup>[14](P.153)</sup>。而这些经费都是由政府承担,四川省政府每年补贴汉藏教理院五千元大洋,中央政府教育部给汉藏教理院补助“汉藏合璧教科书”出版费四百元,这些钱的数量不多,但在太虚看来,“然亦已见政府对于汉藏佛教关系之注意,未尝非佛教前途之一线曙光”<sup>[14](P.151)</sup>。太虚同时又指出,藏汉交流的文化意义不仅深远,而且还能为中心政府节约经费,仅仅耗费少量资金,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明显效果,如“诚能合中枢及康、青官长与藏、汉僧界、学界高德,以共同祈求西藏福利之实现为目标,从是以进行,则中央政府虽每年耗费一万万元,亦较之甲兵十万为节省!况其效功之崇高博大,又远非十万大军之可企及哉”<sup>[14](P.275)</sup>。法舫法师则强调:“我觉得我们政府用佛教僧人去严密促进汉藏感情,巩固西南国防,比用什么武力都好。宗教的信仰力,能使全西藏僧俗人民,合而为一,一心归命我们中央。我们是佛弟子,不论从那一方面着想,都应该去做这工作,替国家尽一点力量。”<sup>[4]</sup>

民国汉藏佛教交流历史,给我们一个启示,这就是我们不能忽视历史的经验,传统是可以借鉴的。“昔第三代达赖以善知清室当入主中国,遥相赞助,得享清代维护西藏数百年之安乐。今中华民国正将达成亿万斯年伟大国家之际,藏族本早为共建民国之一宗族,在此时岂应不熟察机先,观照中枢之所需要,急起直追为力所能及之贡献,以立功于建国之际,而收共有、共治、共享之利益于无穷!”<sup>[14](P.282)</sup>历代汉藏佛教交流,催生了民族团结的因子,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借鉴传统,尊重历史,要与因缘时节相联系,因为历史时期不同,所处的环境与对象也不同,但是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是一贯的,在平等与尊重的基础上,所有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员。

民族应该如何交流,站在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现代汉藏交流的一个重要问题。民国时期藏区外受英国势力干扰,内与中央政府疏离,实行的是政教合一政体,如果“含有政治军事色彩的人,不论走那一条路,都不能容易进西藏,只有出家人很容易进去,你是出家人,西藏政府也不防害你,这是实际情形”<sup>[4]</sup>。故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成为当时最有效的主要手段与方式之一。内地与藏地的佛教文化交流主要是在青海与四川两地的藏区完成,西藏处于封闭状态,中央政府只是在那里设立办事机构而已,行使名义上的主权。

现代汉藏交流的历史很快就到一百年了,我

们现在面对的是新的环境与旧的原则共存的时代。政教合一的政体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体制。交通与信息的发展,已经彻底改变内地与藏区的联系,通信与网络、飞机与火车将藏区与内地紧密联系起来,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特别是在现代信息网络的高科技引领下,藏汉之间的联系已经超过以往仅限于宗教文化交流的范围,两种文化全面接触,超越了原有佛教的范围,但是作为传统,藏汉佛教文化交流仍然是基础性的,而且是必须的、不可缺少的,并有着广阔的前景。旧有的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仍然没有改变,我们面临的仍然是国家安全维稳与国家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属于顶层设计范畴。

“顾佛法无疆域民族之别,惟以所传习之文字与教制不同”,<sup>[12]</sup>鼓励各种文化交流,从宗教角度而言,就是鼓励各种宗教文化在交流中,从和而不同走向“同”,这是指教义上的“同”,例如“但西藏依因明比量的辩论方式与复兴现今的中国佛教很有补益,因为中国佛法之衰病在僮侗,以此为劝学因明研究教理之一方便,固亦甚善。”<sup>[21](P.441)</sup>但在民族习俗上仍然可以保持“非同”,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经过多年考验后,建立在民族团结基础上的新佛教,亦即太虚大师所追求的“大中华完整之佛教”。

#### 参考文献:

- [1]太虚.从沟通汉藏文化说到融合汉藏民族[J].海潮音,1938(10).
- [2]彭光谦.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开拓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前景——10位专家解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之十)[J].党建,2013(12).

[3]太虚.西藏问题之适当解决[A]//太虚大师全书(第27卷)[J].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

[4]法舫讲.碧松记.毕业后的责任与出路问题[J].海潮音,1937(3).

[5]法舫.西藏特别欢迎内地僧人——多杰格什宣传别蚌寺决议[J].海潮音,1936(1).

[6]法舫.复兴中国佛教的史的印证[J].海潮音,1941(1).

[7]法舫.卷首语[J].海潮音,1936(4).

[8]法舫.从武昌佛学院到世界佛学苑[J].海潮音,1948(10).

[9]太虚.日伪亦觉悟否——二十七年春为拥护抗战建国纲领作[J].海潮音,1938(4).

[10]太虚.汉藏教理融会谈[J].海潮音,1937(2).

[11]法舫.欢迎藏文学院诸师东返宏法[J].海潮音,1936(8).

[12]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缘起[J].海潮音,1932(1).

[13]法舫.喜饶格什应聘讲学[J].海潮音,1937(5).

[14]太虚.太虚大师全书(精第24册)[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15]斯陀.第二次参政会闭幕有感[J].华南觉音,1938(12).

[16]法舫.现在的态度和工作——从本刊的立场说起[J].海潮音,1939(12).

[17]太虚.太虚大师全书(精第28册)[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18]太虚.太虚大师全书(精第17册)[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19]太虚.太虚大师全书(精第1册)[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20]太虚.太虚大师全书(精第18册)[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收稿日期 2015-04-20 责任编辑 尹邦志